

刘春生： 平芜尽处是春山



■本刊记者 晓 尧

A

“回首以往,感到我这一生大都虚度无痕,惟有一件事尚可聊以自慰——那就是在为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有着重大意义,而却被传统观念长期鄙薄的职业教育争取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学科位置方面,竭尽全力地做了一些事情。”我国著名的职教专家、今年62岁的刘春生先生如是说。刘现任天津大学职教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

2005年,在天津大学建立了我国首个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作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带头人,对此,刘先生自然格外欣慰和自豪。从1989年在天津大学举办的全国职业学校校长培训班讲授职业技术教育理论起,到1997年在天大本科师资班开设职业技术教育学课程,继之1998年在我国工科院校中率先设立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点和职教研究所,再到2000年天大在全国首批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岗攻读硕士学位,2003年在天大相关学科中首次招收职教管理博士生;直至去年天大获得批准设立全国首个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用了16年的时间,刘先生主持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跨越,在刘先生的内心中,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他说在花甲之年这一感觉尤为强烈。

从1980年调到吉林技师师范学院任教算起,刘春生在职业教育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整整耕耘了26个年头。作为学者,他敏而好学,治学严谨,著述丰赡;作为教师,他克尽职守,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作为专家,他曾多次受国家有关部门的邀请,参与我国职教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的咨询和制定工作,连续四届被聘为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职业教育学科组成员,还担任了多个学术团体和组织的领导职务。所以,我的一位同事评价说,“现在仍在职业教育工作岗位上,并且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整个发展进程的老同志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先生具有符号意义,他既是见证者、参与者的代表,也是理念传播者、思想推动者和理论开拓者的代表。”

刘先生本人并不喜欢用“符号”来评价自己:“一旦被标定为符号,差不多就是僵化的了。”但是,他认为还是有必要在60多岁的时候,对自己的“职教人生”做一个简略的回顾。“也算是对自己作一个交待。”

刘先生说,在这26年中,于职业教育他大致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包括创办新中国第一份职业教育杂志,撰写文章,为职业教育奔走呼喊;二是努力创建中国的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包括主编《职业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管理》等基础理论著作,在国家重点大学率先建立职教研究机构,参与国家职教研究规划和组织群众性职教科研活动等;三是培养培训职教高层次人才,包括在国家重点大学里建立第一个职业教育硕士点、博士点,参与策划和实施职业学校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工作,以及对全国职业学校校长开展培训等。

B

因为“家庭出身”原因,在那个重视“根红苗壮”的年代,年轻的刘春生的成长历尽坎坷。不过,他所钟爱的古典文学却给了他另一方天地。徜徉其中,与圣哲先贤们日夜神游,不但让他获得了极大精神安慰,同时也让他的学识修养和人生境界得到了升华。

1980年,从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学习结业的刘春生,由吉林省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调到刚刚新建的我国第一所职技高师——吉林技师师范学院教授大学语文。这所学校是

改革开放后国家为满足快速发展的技工教育需要而专门批准成立的旨在为职业学校培养专业课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后来改称职业师范学院。刘的授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喜爱,很快在这所工科型的大学校园里便有了一群“古典文学”青年。20多年后,同学们聚会时仍然对“讲语文的那位刘老师”的才学津津乐道。

虽然刘春生在古典文学尤其是唐宋诗词研究方面已崭露头角,一些权威电台和报刊经常约他写评介性文章,但他却没有沿着他十分钟情且花费了极大心血的这个专业方向走下去,而是做了另一种选择。

1981年,为了更好地发挥推动职教事业发展的“工作母机”的作用,刘所在的学校创办全国第一份职教刊物《技工教育》(后来改为《职业技术教育》),刘奉命参与创办和编辑工作。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职业教育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做出了把自己的余生献给职业教育理论建设事业的新的选择。

“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就好像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搭建高楼大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有人从挖地基开始,胼手胝足,一砖一瓦地干。虽然很辛苦,但绝对是开创性的工作,是一定会被历史记住的伟大事业。”这句当时国家劳动总局的领导勉励大家的话,深刻影响了刘春生,并且许多时候都被他引用来激励后来者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们。

与坐在书斋中皓首穷经的古典文学研究方式完全不同,大规模兴起的职业教育恰恰最需用“脚”来做学问。事实上,这是历史强加给刘春生们的一种无奈而又必需的选择。20多年后,刘先生对这段历史做了这样的解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可能通过法律的、市场的或经济的手段来发展这种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只能用老招法——长官意志、行政命令、红头文件、会议部署,相当多的人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从普

教到职教的角色转变的。但是角色一变他们面对的却是一片空白——实践上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要干的要教的是什么;理论上也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干怎样教。怎么办?只有靠自己,边干边学边总结边提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一解释,让我们立即想到了德国哲人海德格尔的一段精彩之语:不是我们要去思,而是从我们出发去思,而是那被思的拉我们去思,是它在召唤我们,向我们要求着执著。

“那被思的”很快就把文人情怀很重的刘春生深深地吸引住了。《技术工人的摇篮——访齐齐哈尔车辆厂技工学校》是刘撰写的第一篇关于职业学校的报道,也是《职业技术教育》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总结职业教育办学经验的文章。为了撰写该文,刘春生在春节刚过就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来到坐落在大兴安岭脚下的校园,和师生吃住在一起,听课、座谈、访问、到工厂调查,忙得不亦乐乎。一周以后,一份近万字的报告一挥而就。同事们看了后都说这已不是一般的通讯报道,而是充满激情的报告文学了。于是,在这份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职业教育杂志上专门设立了一个现在看起来似乎非常可笑的栏目:“报告文学”。当然,从历史上看,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它的激情、文采以及形式,而是它所归纳出的办好一所职业学校应该关注的要素。刘用典型和生动的事实悉心概括的诸如办学理念、领导班子、教师队伍、过程管理、教学组织等环节在当时颇具启示作用。后来不久,国家劳动总局的有关领导提出建设重点技校的思路,在谈到重点校条件时专门阐述了上面的几项内容。

C

钩稽历史的行迹收获思想的果实,是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有古典文学专业的背景,所以,刘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与李炳海先生合著的《谈

先秦时期的百工及其教育》。这篇发表在1982年第一期杂志上的长文,详细考证论述了先秦百工的种类、他们的社会地位、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试图在文化上寻找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此构成姊妹篇的另一研究成果,是两人合著、稍后发表的《儒家的职业教育观》,这篇文章首次考证了先秦时期的儒家和百工教育的关系,旨在揭橥我国职业教育之所以受到鄙薄的思想根源。他们的一些观点被后来治职业教育史的研究者们所关注和认同。

对现实满怀激情的刘春生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在古籍中爬梳历史。他很快就把目光投放到现实的问题上。在1984年第11期杂志上发表的《职业教育功能谈》一文,是他对职业教育的一些本质属性不断思考的结果。尽管其时职业教育已呈遍地开花之势,但在理论上人们对它仍然缺少起码的认识。直觉告诉他,所谓的理论建设工作应该从廓清和厘定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做起。与其他的“地位论”者、“作用论”者不同,他认为对职业教育的本质只有从“功能”的角度才能揭示得更为清楚。在文章中,他系统论证了职业教育在经济建设上具有投资功能、在劳动就业上具有平衡功能、在人才结构上具有调节功能、在人才成长上具有扬长功能。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关于职业教育论述中最早的“功能论”之一。若干年后文中所提示的四个方面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最基本论域。

1985年,《职业技术教育》正式公开出版,面向全国发行。是年,刘春生被任命为杂志主编。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职业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办学方针、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二是1986年7月全国首次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职教工作任务。刘春生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

全国职教会,他用“心似百花开未得,年年争发被春催”来描述自己兴奋的心情。

这种形势无疑给了刘春生和他的事业更加宏阔的人生舞台,当然他也必须从更加宏阔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事实上,这期间接受国家教委职教司科研立项的任务,他已经带领同事们开始尝试从整体上把握未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走势。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系统调研和反复论证,在1987年年初以课题组的名义完成了一份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的咨询报告。这份长达14万字的报告由2000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经济、科技、社会背景,通过对已往经验及教训的分析所得出的今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任务,对现行政策的评估和未来决策的分析及对发展方案的探讨,战略对策的选择与设计等五个部分组成。这是当时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要翻两番、全民实现不同层次的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后,对中、远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若干个宏观上的关键问题提出系统判断和建议的首批研究成果之一,具有开拓性意义。文中所提出的“到2000年,要求我们的教育除了培养3400万到4000万的专门人才外,还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初、中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数以亿计的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有文化、有技术的城乡劳动者”;“职业技术教育在未来必然会置身于巨大的就业压力背景之中,因而必须适应劳动就业领域的一系列变化,成为人们就业、转业的必经之路”;“建立我国独立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势在必行,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必须突出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地位,形成‘普教’、‘职教’、‘高教’三者并重的格局”等观点,现在看来,无疑都具有令人钦佩的前瞻性。

这一研究成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后来以此为基础,刘春生和时任国家教委职教司副司长的孙震瀚

先生一道共同承担了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七五”国家重点社科课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任务。

D

沿着宏观决策与规划研究方向,刘先生一路披荆斩棘、奋力前行,他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坚韧让人感动。从“七五”以来他共主持完成了11项国家和省部级立项的重点课题,其中包括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市(地)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研究与实验”、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制定区域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规划的个案研究”、全国农科教结合领导小组立项的国家重点课题“21世纪农科教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教育类)国家一般课题“当前职业教育热点问题研究”、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发展本科和研究生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与此同时,他还撰写或主编出版了《职业技术教育导论》(1989)、《走向21世纪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990)、《职业技术教育管理》(1992)、《中国职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1992)、《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高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2000)、《职业教育学》(2002)等20余部学术著作,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中国教育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述。

刘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受到了全国教育科学成果首届、第二届评奖以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奖励,这为他赢得了学术声誉。但在他看来,“对一个侧重宏观政策研究的学者而言,其价值应该主要体现在他的思想能为决策所采纳,成为行政推动的力量。”为此,他努力为国家有关职业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咨询。

199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是一份具有

历史性意义的重要文献。他是该文件的前期起草小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在该文件中都得到了反映”。在起草2002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时,有关方专门调阅了刘主持完成的“关于职业教育市(地)统筹管理体制的研究”报告,报告所提出的“分级管理,强化市(地)统筹”的思想受到高度关注,被吸进文件中。

刘先生还认为,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学者,除去执著于理论建设而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义务,就是要担负起思想普及的工作。“因为职业教育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是人民大众的教育。”

20多年中,他通过讲学、培训等形式,到各地、各基层学校阐述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不遗余力地推动职教战线的改革运动;他还利用自己的学术条件,为许多地区和行业部门提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咨询,表现出一位学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

虽然没有行政管理上的职务,但刘先生在行政协调方面的能力也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主持的一些宏观方面的研究项目往往需要各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才能取得成效,而事实上,他总能动员起各方面力量协作攻关,包括大范围实施由行政部门支持的改革实验,这已经成为了他主持项目的一大特点。谈起这方面的体会,他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诀窍,不过是两条:一是靠思想的力量,二是靠人格的

力量。”

1991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刚刚结束,刘先生就把在会上受到表彰的全国各地57所职业高中的代表聚集在一起,举行了“全国先进职业高中校长研讨会”,交流办学经验,探讨改革方向。研讨会取得了很大成功,形成了每年举办一次的“例会”制度。最后这个会议发展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最早的几个分支机构之一,成为了很有影响的全国群众性学术团体。

刘先生的勤奋和刻苦,在同事们中也极有口碑。他在编辑部工作时,大家从未觉得他有节假日、休息日,即使是公出回来,风尘仆仆的他总是下车就直接回到办公室开始习以为常的伏案工作。实际上,他年纪最长,这样的工作作风和习惯无形中也给了周围的人很大的压力,因为必须跟上他的节奏才能说得过去。刘先生似乎对此心知肚明,每到周末就自掏腰包让人买些猪头肉和啤酒,在办公室请大伙“撮一顿”,算是一种“补偿”。有时,他也会张罗着到某个景色秀丽的所在,把酒临风,放松一下,兴致所至,不善唱歌的他还会哼几句山东老家的小曲搏大家一笑。

1996年调到天津大学之后,他依然如故,习惯于超负荷的工作,每年要带2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一心想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急需的职业教育高等科研人才、教学人才和管理人才。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力不从心的他常常表达对年轻人的羡慕之情。他希望年轻人要加倍珍惜眼前的时光,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认真地积累自己,唯如此,到了人生晚年才能“平芜尽处是春山”。^[2]

人物小档案

刘春生,1944年生,山东平度人,中共党员。1966年大学本科毕业,曾在延边二中、延吉市一中、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80年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结业后,在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先后任教师、副教授、教授、《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社长、主编。现任天津大学职教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职教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的职业教育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